

我的两次高考

潘军

1977年10月全国恢复高考,其时我还在农村当知青。消息传开,我就向村民借了一架板车,堆上全部行李,准备回县城家中复习迎考。刚出村口,遇到了大队的民兵营长,很警惕地看着我。我简单作了说明,那人便很不屑地说:你等考上了再搬也不迟嘛!我盯着他眼睛,笑着说:只要凭考,老子就不怕。这话显然带着情绪。我自两年下乡插队,因受父亲右派问题连累,当兵、招工以及推荐上大学,从来都是没有份的。那时我的最高理想,就是去我母亲工作的县剧团当一名画布景的美工。我绘画完全是自学,异常用功,在农村这两年除了干农活,业余时间都用在绘画上,我差不多把周边的村民都画了一遍,还经常参加省里、地区举办的画展,并且开始在国家报刊上发表作品。因为这个缘故,那年的高考自然就是奔着美术学院而去。我报考的是浙江美术学院(现在更名为中国美术学院)。当时浙美在安徽仅招五人。初试通过,又到合肥参加复试,之后便是体检,一切看上去一帆风顺,我信心满满,结果却没有录取。那一年的高考需要进行政审,尤其是重点院校,而我父亲还戴着一顶右派帽子。有一天,我意外收到了省内的另一所高校艺术系的电报,要我前往面试。我觉得奇怪,因为我并没有报考这所学校。电报是发到我母亲剧团的,母亲把电报递给我,见我犹豫,便说:要去,就给你借钱凑盘缠;不

去,你就明年再来。我说:明年再来。

明年很快就来了。所谓77级、78级两届,也就相距半年。1977年是各省自行出题,考试的时间都安排在12月下旬;1978年才实现全国统一命题,考试时间也改作了7月。而这一次,我突然改考了文科。报考美院失利之后我便很快意识到,除了政审原因,还在于艺术类院校,录取很难有一个客观的硬性的衡量尺度,这就为人际关系的作用提供了便利。我没条件玩这个,那就索性不玩。不过,虽说是高中毕业,但学制已由三年压缩到两年,且有些课,比如历史和地理,基本上就是个摆设,根本没有系统的教学。没有教材,我复习这两门课的资料,一是从县图书馆借来的范文澜的《中国通史》,另一个,就是《知识青年地图册》,这本册子上有一些普及的地理常识。条件有限,时间紧迫,容不得我多想。但我自信文科底子历来不差,复习阶段也就轻松散漫,临考前一晚,还去看了一场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。

考试的地点是在怀宁县石牌镇,母校怀宁中学的教室。考试科目四门:语文、数学、政治、史地。第一天考语文,作文是缩写,将一篇通讯报道进行压缩——这种训练以前从未有过,觉得新鲜。我考得很轻松。回到家里,母亲问我感觉怎样?我说挺好。第二天考数学,这是我的短板。母亲又问我如何。我说每一道题都做了,但每一题都没有做完。说完,

哈哈大笑。母亲还是那句话:今年不行,明年再来。她停顿了一下,又说:你要考到三十岁。这句随口说的话,暗示着高考是我们一家全部的赌注,我没有理由辜负母亲。

发榜的日子到了,得到这个消息是在八月的一个晚上,县城停电。但考生们还是陆续涌到教育局。走廊里楼梯上人头攒动,手电乱晃。突然一个熟人见到我,说潘军你考上了!考得不错!边上的手电光亮全都对我照过来,我不禁心下大跳,暗自重复:只要凭靠……

其实考得一般,四门课总分是347,单科成绩,只记得数学仅40分。好在那年文科录取分数线是300,应该没有问题。回到家里,母亲还在剧团演戏,我和外婆妹妹们团在门前乘凉,等候母亲回来。不一会,我听见了母亲的脚步声,不等我开口,母亲便说:你这回差不多吧?她说一路上都听见人跟她说,你儿子考上了。那时能考上的是凤毛麟角,如同今天考不上的——这算进步吗?我怀疑。

母亲取出妹妹学珠算的小算盘,把我的四科成绩反复加了几遍,然后才自语道:多出四十几分,应该差不多吧?在我印象里,母亲的语气从来没有这样的迟疑。那个晚上,全家睡下后,我用小三角板在地图上按比例尺进行比照,看看哪座城市离家近一点,这样可以省下盘缠——那时我家唯一的经济来源是我母亲每月六十几元的工资,却要养活六口人。于



潘军,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。当代著名作家、剧作家、影视导演。

主要文学作品有长篇小说《日晕》《风》《独白与手势》(《白》、《蓝》、《红》三部曲)《死刑报告》以及《潘军小说文本》(六卷)《潘军作品》(三卷)《潘军文集》《潘军小说典藏》(七卷)等。作品曾多次获奖,并译介多种文字。话剧作品有:《地下》《断桥》《合同婚姻》《霸王歌行》,先后赴日本、韩国、俄罗斯、西班牙、埃及、以色列等国演出,多次获得奖项。自编自导的长篇电视剧有《五号特工组》《海狼行动》《惊天阴谋》《粉墨》《虎口拔牙》等。闲时习画,著有随笔与画集《泊心堂记》等。

是我选择了合肥,十个志愿只填报了一座安徽大学。

很多年后,我把这个场景写进了我的长篇小说三部曲《独白与手势》。



选专业,像是猜谜。土木工程、精密仪器、电气控制……我一无所知,看到资源与环境科学系,这个名字听起来不错,我猜,该是个不错的专业,就它了。其他胡乱填了几个,便交了志愿,任自己被扔进了一个由命运操控着的骰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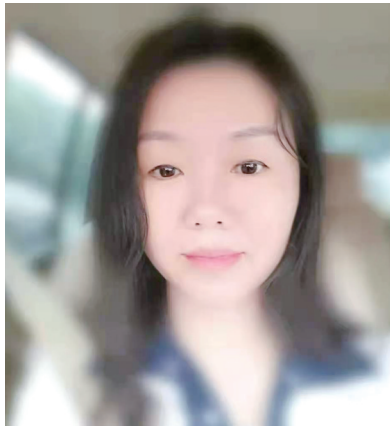
录取,果然像是“掷骰子”,我被录入了一个未填过的专业。我的命运就在这一“猜”一“掷”中确定了。开学后才知道,资源与环境科学系竟是地质系的美丽外衣,若如我所填,我将会在脱离了农民的身份之后,成功地成为“矿业农民”。所幸,命运将我抛进了工业大潮中,成为一名光荣的工业人。

高考的底色调

汤学梅

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,自始至终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牵着,从未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。为了生存,为了“跳农门”,为了职业,总在和现实做着无奈的妥协,这是我们这一代人高考的底色调。

那时候的我们,除了学习,身外的世界是狭小的,心里的世界是



汤学梅,现居上海,文学爱好者。

混沌的,兴趣、爱好,在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。

我原本喜欢文科,可周遭同学、班主任、老师们反复劝说,理科升学率高,我便随大流,选了理科。心里想着的是《平凡的世界》《德伯家的苔丝》,就着昏暗的灯光,笔下写着的是电磁波,是苯环碳链。备考的日子里,我向同学借来一个小录音机,《梁祝》的幻化,越剧《红楼梦》的悲喜,理查德·克萊德曼钢琴曲的唯美,让单调的公式长出了翅膀,开始随着音律飞扬。我清楚地记得,在高考考场里,我耳边回旋的,是《红楼梦》的金玉良缘。

我的高考志愿,也像文字游戏一样。

填志愿时,拿着密密麻麻写着学校名字的书,我犹豫不决。

此前高二假期,青岛三叔回老家,问起我的学习情况。三叔问我:“高考想选什么专业?”我一直想着,怎样用自己学到的知识,改变父辈的命运,改变家乡的面貌,于是信心满

满地答道:“我想学农业。”三叔淡淡地说:“你父亲当了一辈子农民,你考大学还要学农业?”三叔大概被我的答案惊得哑口无言,我们的谈话也戛然而止。

现在,真的走在命运的十字路口时,我该如何选择呢?书上的汉字一个一个在我眼前飞舞,“师范”?不行,邻居哥哥曾反复提醒我,他自己就因考了师范,被分到乡村小学教书,仍未离开农村。“农业”?我不禁打了个寒颤,三叔的沉默成为我备考的底色调,我怕自己十年寒窗,若仍离不开土地,周边村民也会以异样的眼光看我吧。

当“工业”二字飞到眼前时,我似乎找到了答案。对,要改变身份,就要改得彻底,农业的反义词正是工业,不能当农民,就成为光荣的工人阶级。不知这是不是三叔那个问题的正确答案,但我想这是我目前能找到的最佳答案了。于是,我在所有带“工业”两个字的学校里,找到了和我分数匹配的学校,文字游戏就这样结束了。